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丛书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抗议政治学

谢岳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丛书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

抗议政治学

谢岳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议政治学 / 谢岳著.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11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ISBN 978-7-5444-3133-0

I . ①抗... II . ①谢... III . ①抗议—政治学
IV .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12451号

抗议政治学

谢 岳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8.25 插页3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本

ISBN 978-7-5444-3133-0/D·0048 定价: 40.00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谢岳教授勤奋读书，缜密思考，精心布局，字斟句酌，写出《抗议政治学》。这本书，对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与学生，对关心维稳的分析家，对专长发表机智言论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独特价值。

三十多年来，中国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不平衡，焦躁，失落，茫然，怨愤，逆反，诸多形容少男少女的词汇，似乎都可以用来描绘中国社会的某些成员。一些发人深省和令人忧心的事件从开始发生，到层出不穷，从基本平和，到愈演愈烈。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和对策研究的重要问题。不同领域不同职业的研究者，从各自的学术或理论传统出发，依据各自拥有的资料，跟踪时局演进，界定事件类型，分析冲突成因，预料发展趋势。与此相应，文献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仅以界定事件为例，常见的说法就有“群体性事件”“社会治安事件”“暴力抗法”“非正常上访”“异常上访”“泄愤事件”“集体行动”“维权活动”“维权抗争”“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以理抗争”。即使是专门从事相关研究的人，面对五花八门不断翻新的名词术语，也难免感到头绪繁杂，如堕五里雾中。

谢岳教授的新作，为我们时刻保持清醒的大局观，不纠缠于名号之争，不被刻意含混晦涩的术语迷惑，提供了一幅清晰的理论地图和一只可靠便携的罗盘。他在导言中为本书的定位是：“为抗议政治学发展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包括重要概念、命题与理论，为抗议政治研究提供一幅最新版的‘地图’。”这是一个看似容易实则艰难的任务。谢岳教授举重若轻，不折不扣地兑

现了他的承诺。他首先在导言中清楚界定了抗议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说明为什么选用“抗议”一词统称各类抗争言行。读者可以不同意他的界定,但不会因为面对一个游移不定的活动靶而倍感挫折。正文九章,大体上分为三部分。前五章介绍有关抗议政治起源和缘起的主要理论和概念;第六、七章阐述分析抗议政治展开过程的重要学说与术语;第八、九两章从分析路径和测量方法两方面讨论如何检验抗议政治的后果与效果。从谢岳教授的章节安排,可以看出他的方法论和理论观。分析与研究,听起来总有几分深奥,其实就是尝试解释自己关心的事物的“始、中、终”(邓拓语),从三不知走向三知。论事件,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怎样了?论人,问:哪些人?什么人?谁跟谁?回答每个问题,都从个别到特殊再到一般,多走几遍,反复问究竟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检视现存的解释、概念和理论。同意的采用;不同意的,想清为什么不同意,提出替代者。

如果你关心抗议政治并有兴趣开展自己的研究,如果你相信人类的社会政治活动有共性而不屑以本土化为安于无知的遁词,如果你有志于理论创新而不愿重新发明车轮;那么,谢岳教授这本书是可靠的导引,清晰的路线图。

李连江

于香港中文大学

2010年5月31日

致 谢

在入行之前和最初阶段,我从未想过写作这样一本书,一部与国际学术界同步的专业著作。之所以从未有过一丝念想,与中国社会科学界长期奉行的学术政策是分不开的。学界的权威们孜孜以求地想要建构一种能够自成一统且千古不化的真理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际社会的学术成果不仅与吾辈无关,而且往往倾向于被看作是构造革命理论的障碍。于是,我们逐渐习惯了在中国语境下以中国式的语言来想象世界、来构造改造世界的大学问。很难说是哪一位学者在鸿蒙中点拨了我,将我从这种“不自知”之中引领出来。当然,也不是我天生就具有“学术救国”的远大抱负,应当说,给我帮助和力量的是那些无名的学问家,我从他们那里感受到了追求真理的快乐。因此,敬意与谢忱理应给予他们,永远的!

为我提供实实在在帮助的要数香港中文大学李连江教授。我对抗议政治的最初兴趣来自他和欧博文的作品,他们的研究既拓展了我的视野,同时也帮助我找到了理解中国政治的一个窗口。学术方面的来往使我们成为了挚友。虽然他的睿智、缜密、严谨与高远是我难以企及的,但是,和他的交往经常提醒我自己的不足之所在。拙著付梓之际,连江教授慷慨题序,短短数言不仅仅体现我们的深厚友谊,更体现了他作为华人政治学家值得称道的责任意识。我在此感谢他,自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帮助,更增加了后一种意义上的敬意。

我多年闭门修学而不擅长交际,更不善用媒体包装自己,虽然还算勤奋,

“知名度”却并不高,当然也就少有同行们的精彩了,为此,着实也吃了不少“苦头”。好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建军教授为拙著的出版提供了直接的帮助,他的推荐使得上海教育出版社接受了这样的写作计划,也为我继续埋首创造了机会。在此,诚挚地感谢建军和出版社让我能再一次用文字表达自己的学术个性,也希望我的不流于众能借此书带来知音和回响。

最后,用一句不得不说的话来结束这段必需的文字:学术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持久的关爱与理解,我由衷地感谢那些给我支持的人们,他们的无私与高尚将不断激发我创作的激情。

谢 岳

2010年6月1日

导言

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以集体行动的方式实现的,在面对自然界与社会的各种严峻挑战时,联合起来行动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在无数集体行动中,有一类行动是十分独特的,那就是集体抗议。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行动者绝大多数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选择以对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冤情,通过呐喊与抗议向抗议目标施加压力,从而实现他们希望得到的利益。就像其他集体行动一样,由于人类社会无法避免利益冲突,集体抗议就成为人们寻求冲突解决的不可替代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能够对历史上的集体抗议与今天的集体抗议,做等量齐观吗? 300 年前,在欧洲的农村地区,农民经常以抢夺粮仓来回应地主的剥削,以化解生存危机,然而,他们的集体行动常常被地主的武装所镇压;到了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中期,农民的抗议目标已不再局限在地主那里了,他们经常以集体抗议的形式抵制来自国家的税收,制止这些集体行动的也不再是地主的武装,而是国家的军队;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欧洲国家的抗议主角不再是农民,抗议的主题也不再是经济的,大量的中产阶级为了环境保护、人权问题等走上街头,国家对这些抗议者的回应也不再是简单的镇压,而是友好的相互合作;20 世纪 90 年代,集体抗议表现出更加新颖的特点,许多抗议不再以国家为单位,而是国际范围内的集体行动,跨国的社会运动方兴未艾。我们如何解释集体抗议的历史发展轨迹? 街头的呐喊和抗争将人类社会带向何方? 政治生活能够在街头竞争中实现改良吗?

大约在 100 年前,集体抗议声名狼藉,人们往往认为,制造街头混乱是穷

人的天性,没有财产、没有教养的人才会采取暴力行动,来对抗财富与理性,以发泄内心深处的不平衡。这种评价反映在早期思想家与政治家的言论中。以法国的勒庞为代表的第一批思想家或者第一代革命理论家(Goldstone, 1980)十分反感集体抗议,特别是革命行动。在他们看来,这些行动是非理性行为,是暴民心理的集体反映,社会抗争包括社会运动和革命,大多具有负面作用,不可能对社会进步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政治家当然比思想家走得更远,对集体抗议的评价更加保守,他们从政治统治的实用角度给抗议行动涂抹上邪恶的色彩。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抗议行动的名声在学术界有所改观,至少学者们不再把它看作洪水猛兽或社会底层无病呻吟式的集体抱怨。集体行动逐渐被人们冷静和理性地对待。

美国学者以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社会抗争,表明了这种态度的转变。1965年,经济学家 Olson 推出《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一书,将理性选择理论带入集体行动的研究中,它集中反映了这种态度的整体变化。1970年, Gurr 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人为什么造反?》(*Why Men Rebel?*),其基本研究方法是定量的,不仅标志着社会对集体抗议的态度在转变,同时也标志着新的方法论的出现和成型——心理学或心理认知理论。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国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集体抗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加入到研究行列中来,他们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解剖历史事件,新的理论和命题以惊人的速度不断进行着自我刷新。

20世纪70年代盛行起来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文化理论,将解释的视角从心理转向了抗议者的内部结构要素,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80年代至今,抗议理论演变到一个更加理论化的时代。在 Tilly、McAdam 和 Tarrow 的共同推动下,政治过程理论成为当下最流行的方法论。他们一方面试图从政治的视角解释抗议事件的缘起和变迁方向,另一方面,努力将抗议研究综合到一个理论框架下,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系统。尽管这些学术努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排斥和否定关系,或者说是一种递进式的演变,但从整体来看,它们都有着相似的目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解释为什么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而是要弄明白,人们为什么会诉诸集体行动来解决冲突,哪些因素更容易促使人们走上街头。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理论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早期的“怨恨理论”属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它强调社会变迁的诱致性因素;文化构造理论强调情感、意识形态与文化在社会运动中的关键作用;资源动员理论强调正式的抗议组织在社会运动中的动员作用;抗议政治理论(Theor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强调政治的核心作用,它坚持认为,任何形式的集体抗议都与政治存在着互动关系。

我们的分析框架属于抗议政治理论,它的学术基础是政治过程理论,三个关键要素在抗议政治学中占据核心地位,是抗议政治的分析中轴。第一个要素是政治机遇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ies structure,简称 POS),它是最重要的变量。政治过程的理论家普遍认为,如果有利的政治条件不出现,例如政治开放、精英分裂、国家强制能力下降等,大规模的抗议行动不可能发生。第二个要素是动员结构(mobilization structure),它关注抗议者的动员资源,究竟凭借的是正式组织还是非正式组织。第三个要素是关于文化的,在抗议政治理论家看来,仅仅有政治机会和动员结构,仍然不足以使更多的人成为坚定的行动者,人们还需要“认知的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明白为什么必须走上街头,为什么必须向政府表达诉求。

抗议政治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是侧重从政治的角度解释抗议行为;二是强调国家与抗议行动之间的互动性,国家在塑造集体抗议的同时,集体抗议反过来也在塑造着国家;三是摒弃传统的静态分析方法,转而强调动态分析。集体抗议行动进入政治学的视野主要归功于 Charles Tilly。他在 1978 年就提出了著名的“政体模型”(polity model),并在随后几十年中创造性地使抗议政治理论化和系统化。《抗争的动力》(*Dynamics of Contention*)、《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政权与抗争手法》(*Regimes and Repertoires*)、《民主》(*Democracy*)以及《抗争表演》(*Contentious Performances*)都是抗议政治学的核心著作。

为什么在解释集体抗议时我们要特别强调国家和政治因素的作用? Tilly 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细致考察了西欧社会运动和革命的起源,令人信服地指出,资本主义化和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是集体抗议发生的主要动力,因为资

本、强制权力的集中以及全国性政治的出现将地方性抗议转变成全国性抗议,并且使抗议具备了更多的政治色彩(Tilly, 1992)。为什么政治和国家的因素对集体抗议最重要?简单讲,它与以下几个原因密不可分:一是国家作用的扩张使得每个公民无法置身度外,只要存在全国性政府,公民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展开,无论是实施政治统治,还是进行公共管理,国家的影子无处不在;二是政府拥有大量的独占性资源,它的再分配活动会深刻影响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格局,政府有能力决定哪个阶级得到更多或更少以及如何获得;三是政治的力量能够最终决定不同群体的政治身份,能够决定基本的社会关系格局,平等的或不平等的,它可以通过立法权决定吸纳或排斥某个群体。一句话,国家是争夺利益分配的主要场所,除了通过选举决定利益分配格局外,集体抗议同样是争夺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

在简要说明国家和政治对于抗议行动的重要性后,笔者还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抗议行动对国家和政治也很重要?在抗议政治理论看来,抗议行为比那些循规蹈矩的政治行为更加具有政治意义,它们对政治的影响和作用要超过体制内的行为(例如选举和利益集团的游说)(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7—8)。实际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所有重大的政治变迁包括朝向民主的转型,都离不开抗议行动的推动。美国内战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黑人民权运动,为民主的建立与完善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英国,虽然暴力行动相对较少,或者说革命的展开更加温和,但是,王权逐步让位给民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抵制与反抵制始终是英国民主化的主要形式。在欧洲大陆,与英美相比,法兰西的民主之路可谓充满血腥,革命与反革命的拉锯战持续了百年。但是,民主进步恰恰正是在这些斗争中悄悄地进行。从理论的角度看,抗议行为的某些诉求是要突破政治制度的约束,或者说,只有当政治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时,抗议诉求才能得到满足,而一旦抗议行为赢得胜利,就意味着政治有可能进行制度性变革。与抗议行为相比,那些循规蹈矩的行为之所以影响力小,是因为在制度许可条件下向国家表达诉求,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进行的。它们表达诉求的一个重要策略是,规避制度的障碍,在政治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策略,使得利益诉求能够进入政治系统,这样,它们就会对政治制度的变革产生很弱和很慢的影响。在政

治空间足够开放的条件下,寻求政策变迁的诉求一般不需要突破制度障碍,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抗议行为对政策的影响也要超过循规蹈矩的行为,它们更有可能促使政府作出新的决定或者改弦更张。为什么?因为抗议行动能够产生更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政府将抗议诉求纳入政策议程,并作出相应的政治决定,制度化行为却很难做到。值得关注的是,在美国和欧洲,很多利益集团、反对党甚至少数派议员利用抗议行动的影响力,到制度外寻求帮助,动员社会来支持其政策倡议,将制度化行为和抗议行动结合起来(Goldstone, 2003:4)。这有力地说明了,抗议行动的威力正在日益受到重视。国家与抗议行动之间的相互塑造,构成了抗议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体现了这门学科的学术价值。

抗议政治学的内容十分庞杂,Tilly 已有的几部著作主要是通过动态分析,抽取出不同抗议类型中存在的那些相似的过程与机制,抗议政治学的其他重要内容则被忽略了。笔者在 2008 年出版了《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试图以 Tilly 等人的抗议政治理论的过程与机制阐述民主转型的新模式,主要研究对象是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在这本书是想弥补上述研究的缺憾:一方面,将社会运动和革命理论的主要学术成果充分展示,补充被 Tilly 等人所忽略的部分;另一方面,笔者以前的研究主要针对威权国家,没有把民主国家列入其中;第三,像 Tilly 等人的工作一样,很多集体抗议研究的重要成果没有在笔者先前的那本书中反映出来,所以想借此机会加以弥补和完善。由于集体抗议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还几乎是一个空白,因此,这种“查漏补缺”的工作就显得尤其重要。笔者在设计本书时,将它的学术贡献定位在:为抗议政治学发展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包括重要概念、命题与理论,为抗议政治研究提供一幅最新版的“地图”。

抗议政治学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首要的目的当然还是考察集体抗议发生的原因,不过这个基本动因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和文化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考察集体抗议行动为什么会采取不同的形式,和平的或暴力的,革命的或社会运动的或“日常抵抗”;第三个目的是,集体抗议事件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效果,也就是说,它对政治或国家有什么影响;第四个目的是,抗议行动如何塑造国家结构,能够促进民主转型吗?本书的分析遵循抗议政治理论的传

统,强调国家与抗议行动的互动性分析,在抗议行动的每个环节和过程,我们都会观察这种互动性。但由于篇幅关系,不准备采取动态的分析。

在抗议政治学中,我们会遇到很多概念和术语,它们构成了抗议政治分析的基础。在这些众多概念中,几个核心概念显得特别重要,需要加以特别说明。我们在这里用的“抗议”概念,既不是“protest”,也不是“resistance”,而是抗议政治理论使用的“contention”。抗议政治理论之所以选择使用“contention”这个概念,可能是因为它涵盖的内容更加丰富,能够尽可能多地将对抗性集体行动的各种形式包括进来。“protest”和“resistance”相比,一方面,都具有“抵制”“冲突”和“对抗”的意思,冲突特别具有公开性,参与者通常会选择那些能够吸引公众的“示威”形式,在对抗国家和对手的同时展示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contention”还包含其他非示威性集体行动,例如,人们通过法律诉讼政府,这种形式相对来说少了展示力量的动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抗议政治学的第二个核心概念是集体行动。集体行动很容易理解,它指人们为了某个一致的目标而采取的一种协同行动。抗议政治学只研究那些有协同性的集体行动,单个人的或协同性很低的行动不在它的研究范围。抗议政治学的第三个核心概念是关于政治的,即公共政治,它指的是由两类人构成的政体结构:一类人是政体内成员,包括政府和一般成员;另一类人是政体外成员,也就是挑战者。在内部,公共政治应当具备基本的政府结构,例如,全国性政府机关、立法和司法机构,具备全国性军事武装,政府具备类似于抽税这样的基本能力。在外部,公共政治应当具有明确的行动边界和管理人口,政府渗透到社会达到足够的深度和广度(Tilly, 1978:52—53)。抗议政治学要研究的对象是集体抗议、集体行动和公共政治的交叉领域,和平的、非集体性行动和私人政治不属于它的研究范围。

集体抗议只是一种统称和泛指,它由很多类型构成。在集体行动的文献中,社会运动和革命的二分法最为常见。它们是抗议政治的两种主要形式,但在使用时十分混乱,有的将两者等同(Skocpol, 1979),有的认为相互排斥(Smelser, 1963; Tilly, 1978)。与革命相比,社会运动的含义似乎比较明确。代表性的定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 Tarrow 的定义,另一种是 Tilly 的定义。在 Tarrow 看来,社会运动指的是,群众在社会精英、对立者和当局的不断相互作

用中,以共同目标和社会团结为基础发动的集体挑战(Tarrow, 1998:3)。Tilly 的定义稍有不同,他认为,社会运动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政治互动与实践,它是参与者斗争、抗议手法和 WUNC(W 代表价值,U 代表团结,N 代表数量,而 C 代表相互承诺)展示的结合(Tilly, 2004:7)。Tarrow 和 Tilly 的定义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具有显著的政治过程理论色彩。他们都强调运动与政治的互动性,强调相互协作的集体行动,强调运动的组织和寻求变化的目标。这些因素是社会运动所必备的,不过,这些要素似乎也是其他集体抗议行动所必须具备的,例如革命。我们能够在这些抗议形式之间作出区分吗?

关于革命与社会运动的差异,通常被归纳为以下几点。一,革命的目标通常是为了改变政治格局,建立新的政权;社会运动较少政治目的,一般以社会变迁为行动的目标。二,革命在为新政权而斗争的时候,经常采用暴力方式,而社会运动很少诉诸暴力等激进行为(McAdam, Tarrow and Tilly, 1996)。不过,革命与社会运动之间也存在着交叉。Goodwin 就把革命当作社会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社会运动可以转变为革命,革命也可以转变为社会运动。他在这两个概念的交叉部分使用了“革命社会运动”(revolutionary movement);与一般的规模相比,革命社会运动采用运动的和平方式获得控制国家的机会;与一般的社会运动相比,革命社会运动则把获得政权作为行动的目标(Goodwin, 2001:10)。类似的观点在早些时候就见于 Goldstone 的著作中。他与 Goodwin 的不同之处在于,革命与社会运动的相互转变取决于国家镇压的强度,中等强度的镇压会使抗议转变成社会运动,弱强度的镇压容易形成革命,高强度镇压则会导致抗议失败(Goldstone, 1998: 128—129)。

还有第三种抗议类型经常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有时候出现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过程中,人们把它定义为“集体抵制”(collective protest)。集体抵制包括那些参与人数较少、动员范围较小、以问题为抗议诉求的传统抗议手法,例如集体签名抗议、农民抵制化工企业对其农田的污染等。集体抵制与社会运动主要在两个维度被区别开来。一是抗议是否建立在关系网络基础之上。集体抵制的动员对组织和网络的需求不大,它们经常依靠邻里关系、亲属关系进行动员,而社会运动则依赖专业化的运动组织进行动员。二是诉求目标不同。

集体抵制经常要求解决私人的具体问题,问题解决后,集体行动也就宣告结束;社会运动以改变社会为诉求目标,经常涉及公民权的问题(Rucht, 1998: 30—31)。

从集体抵制到社会运动再到革命,我们在集体抗议的类型学光谱上似乎能够找到连续的坐标,三大类型既能够相互区别也能够相互转换,它们大致能够覆盖抗议政治中的主要抗议类型和手法。从学术背景看,社会运动和革命受到的关注最多,集体抵制关注得较少,因此,理论上的积累主要来自社会运动和革命。我们不打算在理论的铺陈中,对来自革命的理论 and 来自社会运动的理论以及来自集体抵制的理论分门别类地进行,而是沿着抗议政治理论创造的传统,将三者的理论整合到抗议政治学的框架体系之下,希望它们之间能够相互解释。特别是社会运动理论,由于解释集体抗议的理论模型大多来自社会运动的研究,革命的理论大多是命题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社会运动的理论模型扩大到革命领域,是一个积极的尝试。

集体抵制、社会运动和革命如何展开呢?换句话说,它们通过什么手段和形式表达诉求和展示力量?在现代历史上,人类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抗议手法(repertoire)的创新过程。从早期的抢夺粮食、宗教庆典、消极怠工、骚乱和械斗到后来的集会、请愿、游行、静坐、示威、联合抵制、守夜、占领工厂或交通要道等,集体抵制、社会运动和革命都离不开这些形式。前者经常出现在集体抵制行动中,被称作旧的抗议手法;社会运动和革命主要以后者为主,被称作新的抗议手法。正因为有新旧之别,抗议手法才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从最初的地方性的、二分的和特殊的手法(旧手法)演变为具有世界性的、模式化的和自主的(新手法)特征(Tilly, 1986: 395—396)。Tilly 赋予集体抗议新旧手法的变化以许多积极意义,这些变化与他坚持的民族—国家建设和资本主义扩张的效果相对应。由于抗议手法已经模式化,地方性抗议有可能演变为全国性运动甚至全球性运动,抗议者相互模仿,这种变化标志着小范围的集体抵制有可能转化为更大范围的社会运动和革命。Tarrow 积极评价了抗议手法模式化对社会运动的影响。他认为,新手法以几个重要的对抗惯例为核心,可以适应许多不同的情况,其各个要素可以在集体行动战役中结合起来;一旦被采用和了解,新手法就可以传播和扩散到其他参与者中,并用来为挑战者服务,

使那些互不相识的分散的人群有可能在对当权者的持续挑战中结合起来,形成现代社会运动(Tarrow, 1998:36)。抗议手法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能够使集体抗议运转起来,更重要的是,它们成了观察政治变迁的一个窗口,同时,它们的变化也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抗议手法的变化同样反映了国家与集体抗议之间的互动过程。

本书虽然由九章构成,但可以分成三大部分:第一章关于抗议的结构背景,延续了结构主义的传统,为集体抗议创造了外部环境;第二章到第七章分析集体抗议的动力机制或者动员机制,关注集体抗议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第八章与第九章讨论的是同一个主题,即集体抗议的结果,前者聚焦在政策方面,后者则讨论集体抗议的政治结构,简要地分析了集体抗议是如何促进民主转型的。

目 录

CONTENTS

序	1
致谢	1
导言	1
第一章 社会变迁：抗议的外部环境	1
一、市场化、经济增长与边缘化	1
二、结构、转型与分裂	8
三、国家建设、危机与崩溃	11
四、文化、身份与冲突	19
小结	25
第二章 抗议的政治机遇及其限制	26
一、政治机遇结构	28
二、遏制机遇的国家因素	36
三、政治威胁	39
四、抗议创造机遇	45
小结	50
第三章 组织与网络：抗议的动员结构	52
一、抗议组织的功能	53
二、抗议组织的类型	57
三、组织的寡头化趋势	62
四、关系网络：微观动员结构	66
五、影响组织发展的政治变量	71
小结	74